

編者的話

2014年8月16日至19日，由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香港青松觀全真道研究中心、山東省棲霞市人民政府主辦，由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全真道研究所、山東省棲霞市旅遊局承辦的“多元信仰下的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山東棲霞召開。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多元信仰下的全真道”，來自美國、法國、韓國、日本和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以及中國社科院、陝西省社科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深圳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山東師範大學、中國道教協會等高校、科研院所和宗教團體的近50位專家學者，就“多元信仰下的全真道”這一主題展開了深入而熱烈的討論。這次會議仍然採取了命題作文的形式，共有十三位學者撰寫了文章，會後經過精心挑選，最終選出十一篇編入《全真道研究》第四輯。

本輯所收十一篇文章，大部分以全真道與其他信仰之間的關係為主題，只有少數幾篇例外。下面對它們簡單做一下介紹。

四川大學張澤洪的《元明清時期全真道在西南地區的傳播》一文，主要探討了元、明、清三代全真道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與發展，以及西南少數民族信仰與全真道之間的關係。該文通過對元代陳致虛傳道思州，明代張三丰傳道貴州平越，西南地區呂仙傳說及遺跡所見全真道的影響，西南地區全真道的傳播及全真道士的修持，西南全真道龍門派的發展及其時代特點等考察，認為全真道在西南地區的迅速傳播，與全真道在全國傳播的歷史大勢是一致的。然而，全真道在西南地區的傳播，獲得了該地區地方行政官員與少數民族大姓、土司的信奉與支持，具有西南地域的歷史文化特點。

美國羅格斯大學劉迅的《詩、書、琴、園：清末南陽全真道主領的精英藝術》一

文，主要以南陽玄妙觀為個案，探討了晚清至民國初年全真道與詩歌、書法、音樂等高雅藝術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南陽這則全真教主領、眷顧精英或者說高雅藝術的案例表明，立足於帝制晚期甚至是民國初期的特殊環境，一些道教宮觀往往能夠實實在在地繼續支持和主領著精英藝術及高雅藝術。還表明，無論將道教宮觀看作是僅為社區儀式和個人崇拜保留的宗教場所，還是將其視為與宋元以來的文化和藝術內容、傳統都絕無瓜葛的空間，這兩種觀點都同樣是錯誤的。真實的情況可能正處於兩者中間。

日本皇學館大學松下道信的《淺談道教對於吉田神道的影響——以〈北斗經〉與內丹學說的關係為中心的考察》一文，主要探討了全真道對信仰日本神道教的吉田家族的影響。松下教授認為，由吉田兼俱創始，在江戶時期盛極一時的吉田神道，不僅對《北斗經》十分重視，而且吉田家也藏有與陳朴著《陳先生內丹訣》密切相關的內丹書《修真九轉丹道圖》。通過對吉田家對道教和內丹說的攝取狀況的分析證明，吉田神道對全真道內丹說的吸收以南宗為主，也曾接觸過元初自稱全真教徒的李道純等人的教說。

武漢大學吳光正、王一帆的《鍾呂傳說與金代全真教的譜系建構》一文，通過對宋金時代鍾呂傳說的清理，以及對金代全真教譜系建構的考察，論證了自王重陽開始即有意識地借助鍾呂傳說來構建全真教譜系，而這一建構主要是通過詩文創作與傳播來實現的。王重陽如此做的目的，一是自神其教，二是自我神話，從而為本教之存在與發展尋出神聖性與合法性依據。這就糾正了學界長期以來關於全真教鍾呂神話譜系出自全真道三代弟子假託的誤解。

臺灣真理大學蕭進銘的《身患、無身、真身及等觀一切——王重陽對於老子“身體”說的體證及發展》一文，主要對老子對王重陽的影響進行了深入探討。他認為，老子的有身及無身之說，對於後世的道教、內丹及王重陽影響極為深遠，甚至可如佛教的無明說及基督教的原罪論一般，被看作道教神學最為核心的問題之一。王重陽的凡軀與真身之論，正是老子有身、無身之說的深刻發展。無論是凡軀、真身的具體內涵、由來、本質、關係及轉化之道，王重陽立基在自身內丹修證的根本基礎之上，除了承繼老子的有身、無身說外，更融入佛教等其他思想，而進一步拓深老子及道教的身體說，並對後世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

中國社科院李志鴻的《“十二老母朝無生”神話初探——以開封、南陽的宮觀為中心》一文，主要以河南開封、南陽的宮觀為例，探討了明清民間宗教中的無生老母信仰與全真道之間的關係。最後他指出：在歷史與現實中，無生老母以及眾多老母神話已經成為道教全真派和民間宗教共用的宗教資源。無論是“十二老



母朝無生”神話的敘述，還是“無生老母”在道教與民間宗教丹道實踐中的重要位置都告訴我們：就宗教意義而言，民間宗教與正統宗教之間沒有隔著不可逾越的壕溝。

中國社科院聶清的《全真道與禪宗心性思想比較》一文，主要從心性論的角度入手，探討了全真道與佛教禪宗的關係。他認為，在禪宗與全真道兩個體系中，心性論的差異既是其本體論差異的必然結果，也決定了其解脫路線的不同，是理解其特質的關鍵所在。瞭解他們根本理論架構的差異，有助於更為準確地理解具體觀點細節的意義。

中國社科院林巧薇的《全真道與玄教在元代中後期發展之比較研究》一文，主要對全真道和玄教在元代中後期的發展狀況進行了比較。她認為，元代全真教與玄教都是曾在元朝皇室的支持下而獲得了空前發展的道派，因受佛道之爭的影響，元代中後期，全真道與元朝皇室的关系不如玄教親密，在政治地位上全真掌教也不如玄教宗師的地位。與全真道鼎盛時期相比，全真道在元代中後期的發展略有式微。但是與新興的玄教相比，全真道經過前期百餘年的發展，其教派勢力、宮觀數量和規模以及在民間社會的影響力也遠遠大於玄教。

齊魯工業大學秦國帥的《明清嶗山全真教的神明信仰及宗教身份》一文，通過對明清時期嶗山太清宮和馬山玉皇宮的考察，得出如下結論：金元時期全真教所形成的信仰系統，明清時期在地方社會及道眾中遭到有意無意的忽視。相反，祖師崇拜、內丹修煉以及命名系統這三種制度性因素却仍舊在維持著嶗山全真道士的宗教身份。儘管地方民衆會因自身需求及所處的社會環境而將不同的社會身份加諸全真道士之上，然而，由制度性因素構成的宗教身份却並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仍舊與金元時期的全真教有很強的連續性。

陝西省社科院張方的《全真道士周玄貞與萬曆皇室》一文，對明代全真道道士周玄貞與明萬曆皇室的关系進行了探討。明萬曆時期，全真道士周玄貞深受皇室重視，其主持皇家的齋醮儀式，立道場講《道德經》，並為皇室督工修建了保國隆壽宮、泰山金殿等道教宮觀。萬曆皇室對全真道士的重用，說明了此時全真的政治地位較之明初已有了較大提高。

湖北汽車工業學院王闊的《論劉一明〈道德經會義〉的詮釋特點》一文，主要對全真道龍門派第十一代傳人劉一明著《道德經會義》一書的詮釋特點進行了研究。最後得出結論：劉一明對《道德經》的詮釋主要具有以下兩方面特點：第一，受宋元以來道教徒解釋傳統的影響，仍然以“內丹心性學”解老。第二，沒有受到清代乾嘉考據學風的影響。